

20 世纪下半叶工农兵学哲学运动论析

□ 王向清 曾坤香

摘要:1957 年至 1978 年,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这场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包括文化水平的提高、主人翁地位的激励、“大跃进”经济建设举措的呼唤,毛泽东对哲学的重视与大力提倡;这场运动经历了初步提出、逐渐巩固、持续上升、汇成高潮、快速消退等阶段;工农兵学哲学的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毛泽东哲学著作、毛泽东语录等;工农兵学哲学产生了四方面的积极意义:提高了工农兵群众的理论思维水平,提升了工农群众改造世界的能力,激发了工农兵群众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热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了有益探索;但工农兵学哲学暴露了片面化、碎片化、庸俗化、工具化等局限。

关键词:工农兵学哲学 原因 展开阶段 学习内容 积极意义 局限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6)04-013-06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至 1978 年初,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我国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等普通群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哲学运动。本文拟就其开展的背景、推进过程、学习的内容、积极意义与局限等方面做出解答。

一、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兴起的原因

任何一场群众运动都有其开展背景或原因,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开展更是如此。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工农兵学哲学提供了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扫除文盲活动的持续开展为工农兵学哲学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文盲率达到 80%,农村人口中文盲率高达 95%。1950 年,党和政府决定开展扫盲教育,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为有效推进这一运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 1952 年 5 月 24

日起,开展全民性的扫盲运动,群众性学文化运动迎来高潮,并且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1958 年 1 月至 3 月,全国有名报刊皆为扫盲“大跃进”大作宣传,且收效明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先后发表了《扫盲工作也能“大跃进”》、《扫盲工作也必须“大跃进”》、《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只欠东风》等文章。这些报道虽然受“大跃进”氛围的感染有浮夸的成分,但当时在全国城乡的确开展了扫盲运动,提高了工农兵群众的文化水平。

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抽象思维、反思为特征,如果主体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显然是无法学哲学的。这就是说,认知一定数量的文字,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是学习哲学的必备条件。而扫盲运动使工农兵群众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为他们学习哲学创造了条件。

其次,主人翁地位激励工农兵学哲学。

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农兵是国家的主人,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不再受剥削,但在科学文化领域一

* 作者简介:王向清,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湘潭 411105;
曾坤香,湘潭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湖南湘潭 411105。

时还处于失语地位。为了成为国家全方位的主人、真正的主人,他们必然要求学习科学文化。而哲学不但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而且是科学文化的内核、顶层、精华部分,更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不但是对对象世界观察、实验所形成的知识,更是对人性和天道等形上之域体悟的智慧。学习哲学,拥有一定的哲学素养,大多能以辩证的观点即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变化的观点看待矛盾、处理矛盾,从而顺利推进工作。学习哲学,还能使人们的谈吐典雅、睿智、幽默,提升气质、品位。正因为如此,翻身解放的工农兵群众中的部分人迫切希望学哲学。

哲学工作者吴江在谈到上海求新船厂工人学哲学和河南登丰县三官庙乡农民学哲学的根据时指出,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基本是按照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规律办事的,只是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现在,他们已是社会的主人、自然界的主人了。为了自觉地完成创造历史的任务,他们就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自己成为自觉的辩证唯物论者。为了做社会的主人、自然界的主人,也必然要破除迷信,使自己成为“哲学的主人”^[1]。

再次,“大跃进”经济建设举措呼唤工农兵学哲学。

1957年秋至1960年冬,在毛泽东的号召、推动下,我国开展了以高速度、高指标为特征、试图凭借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高涨的群众热情,实现工、农业生产飞跃式发展,实现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动。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与当时的现实间没有保持必要的张力,也就是理想挣脱了现实的制约。“大跃进”时期理想与现实间张力的失衡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无视生产力水平低下、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劳动者综合素质低、管理落后等缺陷,通过片面张扬人的意志力量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迅速提高生产力,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二是超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无视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快速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企图建立具有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生产关系。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大跃进”经济建设目标就只能凭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张扬人们的主观意志去实现。而学习哲学是认识自我,发展、提升自我,准确判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的最佳途径。冯定当年撰文认为:人们要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不但能认识世界,而且也能改造世界。当人们的意识准确地反映了客观存在,以它指导实践,就能加速地改造对象世界。^[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揭示,发挥主观能动性是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的,也就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哲学工作者当年撰写的相关文章在探讨二者关系时,实际上论证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以不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将主观能动性张扬成唯意志论。因此,从某种意

义说,工农兵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掘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凸显主体意志。

最后,毛泽东的倡导和力行激励工农兵学哲学。

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兴起与毛泽东本人对于哲学的重视与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提出改造中国非普及哲学不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倡者、力行者,毛泽东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很早就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4]

毛泽东推动哲学大众化的过程除了他本人深入钻研哲学外,还提倡和组织干部与哲学工作者学习哲学。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示,成立了延安新哲学学会,有组织地开展哲学的研究与普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哲学的研究和通俗化。1955年3月3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号召“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5]

除了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一要求外,毛泽东还号召人民群众学哲学。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上讲到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时指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6]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不只是少数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的事业,而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件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一件事业。^[7]作为民族的主体,工农兵学哲学,哲学自然成为民族的事业。

二、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展开阶段

从笔者搜集到的文献资料看,江西省乐平县超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石中炳从1956年7月起开始个人学哲学,是农民自发学哲学的先锋;农民有组织学哲学发端于登封县三官庙大队,开始时间为1958年2月;而1958年3月上海求新船厂工人有组织地学哲学,掀开了工人学哲学的序幕;1977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更好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文章,是最后一次直接以“工农兵学哲学”为主题的新闻报道。随着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于1978年快速消退。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经历了初步提出、逐渐巩固、持续上升、汇成高潮、快速消退等阶段。

1. 初步提出(1958年上半年-1959年上半年)

1958年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上海工人学哲学用哲学”为题报道了上海求新造船厂组织十一个哲学小组,认真钻研毛主席著作,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形。1958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撰写的文章《登封县三官庙全民学哲学的经验》。文章说,当河南省人民正以冲天干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登封县三官庙的农民豪迈地升起了学哲学、用哲学的一面红旗。

经过报刊对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学哲学、河南登封县三官庙大队全体社员学哲学的报道,一股全民学哲学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河南、黑龙江、上海、天津、河北、山西、重庆、陕西、广东等省市的工人、农民纷纷组成“哲学学习”小组、“农民学哲学夜校”、“工人学哲学夜校”、“红专学校”等,工农群众学哲学蔚然成风。

当工人、农民学哲学风生水起时,解放军士兵也掀起了学哲学的热潮。农民、工人、士兵学哲学浪潮的相互激荡,至1958年底,汇成了全国范围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

2、逐渐巩固(1961-1965)年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提倡、号召,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大力响应,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平稳推进后,迅速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开来,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便由初步提出阶段进入逐渐巩固阶段。反映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论文等也多了起来,据从国家数字图书馆《人民日报》数据库采集的数据来看,1961年至1965年间含“工农兵、学哲学”关键词的文章的绝对数量与提出阶段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比重也有所提升。1961年《人民日报》上含“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有196篇,占全年文章总数的0.8%,到1965年就上升到了3.0%。

在逐渐巩固阶段里,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呈现两大趋势: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指导工农兵学哲学,1962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沙英撰写的《多写一些理论通俗化的读物》一文。文章指出:“有千千万万的人,包括一般基层干部、在学校中受教育不多的青年人、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等等,他们迫切地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理论的基础知识,对一般理论书籍不能很好地消化。因此,为他们生产一些精神食粮,多出一些理论通俗化的读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8]

二是哲学工作者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逐渐巩固阶段的后期,中央和地方党组织要求哲学工作者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参加基层的实际工作,改造自己的思想,培养起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逐步学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处理问题。从当时的报刊宣传的情况来看,这一阶段已开始大力宣传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重要性。各类学

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开始占据着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主要版面。从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检索到的数据看,1965年开始,检索“工农兵、学哲学”两个关键词,无论是标题还是正文绝大部分与毛泽东著作相关。如《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更高举》、《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改造大自然的斗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主观、片面做斗争》、《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必不可少的思想建设》等不胜枚举。

3、持续上升(1966-1975)年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蔓延与深入,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也愈演愈烈,进入持续上升阶段。这一阶段,反应工农兵学哲学的论文数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据从国家数字图书馆数据库采集的数据来看,1966到1975年十年间,《人民日报》上含“工农兵、学哲学”的论文所占比重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1970年《人民日报》上“工农兵学哲学”相关文章总数达到1318篇,占全年文章刊发总数的11.6%,为此阶段之最。持续上升的十年间,“工农兵学哲学”相关文章出现的平均比率达到7.66%。

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被强化到了空前的高度,哲学被诠释为斗争哲学,工农兵学哲学也就是学习斗争哲学。当时的新闻媒体声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就是要抓住政权这个根本问题”,“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问题的哲学争论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并对主张“合二为一”的学者进行无情斗争;强调哲学上的两军对垒,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不能把哲学斗争简单地看作是“学术之争”。

4、汇成高潮(1976-1977)年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继承他的遗志,决心把他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把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掀起了学习的高潮。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一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工农兵学哲学相关的文章达1400多篇,占全年文章总数的11.4%。

1977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决定指出,要采取在职学习、办业余政治学校、读书班、学习班等多种形式,把广大干部和广大工农兵组织到学习中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又立即做出了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出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工农兵学哲学运动。

1978年3月,华国锋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号召“开展一个

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其中就包含了工农兵学哲学的内容。1978年下半年,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工作要发扬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的观念渐渐为学术界接受。完整地准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某段话、某个观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新的形势下,工农兵学哲学的势头渐渐减弱。这段掀起的高潮来得猛烈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仅一年有余。

5、快速消退(1978-1979)年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哲学研究工作也必须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势头随之快速消退下去。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很少发表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从国家数字图书馆《人民日报》上采集的数据来看,1978年以“工农兵、学哲学”为关键词搜索的相关文章为463篇,占全年文章总数的3.5%。1979年就直接下降为208篇,占当年文章总数的1.2%。而这些哲学相关的文章也大多是讨论将哲学研究推入正轨,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不再是此前的号召广大工农兵群众如何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1979年4月18日至26日在济南召开了全国哲学规划会议,重点就是讨论落实全国哲学规划,使哲学研究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在重新规划哲学研究工作的同时,还对“文革”时期一些将学术探讨归为政治斗争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反思、批判。比如对“合二而一”的问题学术界重新展开了讨论,“合二而一”的政治冤案的昭雪,对此后学术界发扬民主,坚决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把理论观点上纲上线,不将学术争论当作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终于从“阶级斗争”、“斗争哲学”的框架中解放了出来,重新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主题、新变化和新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新的理解和阐发,这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奠定了基础,哲学研究逐渐步入正轨。

三、工农兵学哲学的内容

工农兵学哲学的学习内容经历了由主要学习马列著作的经典文本到学习毛泽东著作到直接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过程的转变。随着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平息,学术界又开始了真正的哲学探讨。

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最初提倡学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改造思想首要的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结合起来,把破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结合起来,把红与专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民日报》则刊发了不少介绍马列经典著作的写作背

景和内容的文章。组织翻译出版了系列世界哲学名著,如《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等;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这一专门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1963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数据“1956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卷。除全集外,还出版了各种单行本、专题文集以及选集。未收入全集的其他著作也已经或者正在翻译出版。现在提供给读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已经不是几百、几千册,而是几十万册,甚至百万册。到目前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已经出版到第十三卷。在不久的将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部三十六卷中文译本,将作为一套完整而珍贵的礼品献给我国广大读者。”^[9]

短短六七年时间出版这么多数量的马恩著作,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大量传播与学习。但是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受广大工农兵学员知识水平的限制等原因,阅读外国经典哲学著作难度太大。而毛泽东思想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建设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在开展不久就将学习重点放在了毛泽东哲学著作上。“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学哲学的内容简化为学习体现哲学思想的毛泽东语录。

“文化大革命”十年时期,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总共已出版发行了48亿多册,比“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出版发行总量增长了七倍,而增长最快的是毛泽东的著作。^[10]1966年1月18日《北京日报》社论报道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1966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安排的通知。通知强调指出,为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各行各业都必须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作为一切工作的纲;必须继续贯彻“头头抓,抓头头”的精神,狠抓领导干部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大力加强对一般干部和工农群众学习的领导,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文化艺术战线上也出现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作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战士。这一时期,各类报刊媒体宣传毛泽东思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196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写的再版前言。前言肯定《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举措。要求全国人民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四、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积极意义

首先,提高了工农兵群众的理论思维水平。工农兵学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哲学的普及、破除了哲学的神秘感,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体现了哲学的大解放,体现了哲学走出书斋、走出课堂、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他们的哲学论文真正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他们的哲学论文,有力地证明,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于提高认识、改造思想,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培养一代共产主义的新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11]

其次,提升了工农兵群众改造世界的能力。工农兵学哲学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且提升了他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哲学指导了人们的生活以及生产实践,推动了生产实践的发展。在当时有限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生产的发展,做到了“精神变物质”。黑龙江省牡丹江水泥厂工人撰写了《认识和掌握生产规律,促进生产发展》的哲学文章,文中提到“生产中的矛盾任何时候都有,生产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只要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些问题,以正确的方法解决它,生产就会不停顿地向前发展。”^[12]反映哲学指导工农兵生产实践的文章数不胜数《汽车驾驶室里的辩证法》、《谈谈种棉花的哲学》、《与庄稼打交道也得运用辩证唯物论》、《用辩证法的精神养猪》、《用辩证观点看连队政治工作的一些问题》、《运用一分为二的工匠思想武器,搞好管理教育》等等。在“大跃进”时期,思想也存在着大跃进,这些哲学文章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哲学对于指导生产实践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再次,激发了工农兵群众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的热情。前文谈到为了实现全方面的当家作主,翻了身的工农兵群众主动要求学哲学。而通过学哲学,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体也不断由自发到自觉、由自在到自为,即自我得到了提升,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学哲学带来的积极变化,激励着他们中的部分人更加自觉地学哲学。《哲学研究》1965年第6期发表了《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选辑了20多篇工农兵群众写的哲学论文。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青年建筑工人、北京第三建筑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李瑞环就写了一篇。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如何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队员们一起在几年间搞了大小几百件技术革新,还写出了一本十万字的《木工简易算法》的书。从那时起,李瑞环同志就自觉地学习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哲学不但是世界观,更是方法论、价值论、人生论。在哲学理论的指

导下,李瑞环同志由一个普通工人一步一个脚印,职务不断升迁,最后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2008年,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学哲学、用哲学》一书。可以说,李瑞环同志之所以有辉煌的成就,跟当初自觉地学哲学,并长期坚守分不开。应当说,当年自觉学哲学的工人、农民、士兵,在学习中因受益而长期坚守下来的,绝非李瑞环同志一人。

最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工农兵学哲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要求。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学术界提出的路径有:时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笔者认为,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意义重大。理由如下:如果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研究的仅仅是书斋里的学者,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不学习、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运用它作为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指导实践,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让工农兵学习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唯一途径,从而也是掌握群众、变成物质力量的唯一途径。事实也是如此,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农兵群众在认识、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的确创造了不少难以想象的业绩。大众化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群众掌握、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有力论据是艾思奇撰写的《大众哲学》一书带来的巨大威力。1934年11月-1935年10月间,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论文24篇,后结集为《大众哲学》,并于1937年出版。该书因为以生动、深入浅出的语言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当时,国统区的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就是受《大众哲学》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吸引而奔赴延安,投身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斗争的。一位国民党要员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人受毛泽东《沁园春·雪》这首词和艾思奇《大众哲学》这本书的煽动,导致民心倾覆,纷纷投入共产党的怀抱。这位国民党要员对失败原因的分析当然言过其实,但也反映了《大众哲学》带来的巨大冲击。

五、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局限

首先,片面化。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中的片面化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工农兵学哲学强调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强调批判自我、改造自我,忽视完善自我,发展自我,造就理想人格。哲学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工农兵学哲学只注重前一个功能,忽视后一个功能,因而是片面的。其二,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哲学学习与生产劳动直接挂钩。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时期要求专业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向劳动人民学习

哲学”；反之专门的研究被称为“经院哲学”以及“教条主义”。工农兵学哲学还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学习能力和文化水平，认为只有工农兵才是真正的哲学家，而专家、学者并非真正懂哲学。这种推崇业余学习哲学者，贬低专业哲学工作者的观点是片面的。

其次，碎片化。工农兵学哲学运动过程中体现了碎片化的不足，表现在不是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是重点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即使对毛泽东哲学著作的学习也非全面、系统地学，而是重点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而发展到后来，则演变为学毛泽东的语录。工农兵当年学习毛泽东语录的内容主要涉及强调阶级斗争、注重主观能动性、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等内容。显然，若干条语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说是碎片化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说，更是碎片化的。如此学习，不能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再次，庸俗化。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在将哲学普及的过程中将哲学功能庸俗化了。哲学的功能之一是教导人们如何化理论为方法，解决的是无用之大用的方法论问题，是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实现的。所谓化理论为方法，就是将哲学理论化为思维方法以指导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工作方法或操作方法。具体的工作方法、操作方法是具体科学探讨的对象，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思维方法，最基本的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实际是矛盾分析法。而这两条并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和现成答案，而只是为解决矛盾提供了思路。按照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教授的观点，这一思路包括五个环节：从实际出发，保持观察的客观性；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并注意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归纳和演绎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13]这五个环节是逻辑方法，它们要在具体方法的支持下才能实现。比如，第一个环节就需依靠社会调查理论提供的方法才能实现。因此，哲学理论不可能化为具体的工作方法、操作方法。具体的工作方法、操作方法是具体科学提供的。换言之，哲学理论化为方法必须通过逻辑方法这一中介。哲学不大可能起立竿见影的功用，主要解决的不是具体的日常生活问题。而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强调用哲学解决实际问题，这无疑将哲学的功能庸俗化了。

最后，工具化。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宣称哲学是万能的实用工具，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真正的哲学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教会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更教导人们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造就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工农兵学哲学强调将哲学当成改造对象世界的万能的实用工具，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哲学功能的发挥必须通过逻辑等中介环节才能实现。我们不能突破哲学本身所能发挥的作用的界限，将哲学当作万能的工具。哲学便是哲学，有其抽象性，它不能为我们解决实际生产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注释：

[1] 吴江《揭下哲学的神秘之幕》，《哲学研究》1958年第4期，第24页。

[2] 冯定《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胜利》，《前线》1959年第2期第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页。

[7] 许全兴《毛泽东把哲学变成民族的事业》，《党的文献》2013年第5期。

[8] 《多写一些理论通俗化的读物》，《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1日。

[9] 《马克思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日报》，1963年5月5日。

[10] 《周总理关怀出版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1977年1月12日。

[11] 《认真学习工农兵的哲学论文》，《人民日报》1966年1月10日。

[12] 《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66页。

[13]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6年版，第412页。

责任编辑：孟桢